

● 中国近现代史

辛亥时期军政府与分府矛盾斗争析论

霍 修 勇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霍修勇(1973-), 男, 山东曲阜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摘 要] 武昌首义后, 各省纷纷建立军政府或军政分府, 清朝传统的省、道、府(厅)、州县统治秩序被打破, 中国政治制度开始了由专制到民主的转型。军政府、分府整合过程中, 难免产生很多矛盾斗争。就其形式而言, 既有明争, 也有暗斗, 既有口角磨擦, 也有武装冲突, 可谓多种多样。就其性质来讲, 既有革命派和立宪派的纷争, 也有革命派不同集团的对立, 既有集权与分权的较量, 也有专制和民主的消长, 同样不一而足。在南京临时政府和各省军政府的不懈努力下, 各地分府于 1912 年 8 月底基本取消, 新的行政关系初步形成。

[关键词] 军政府; 军政分府; 整合; 矛盾斗争

[中图分类号] K25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4)05-0563-06

武昌首义后, 独立各省大多在原来的省治地方建立了军政府, 在原来的道、府或州县衙署驻地建立了许多军政分府^①。

军政府是一种独特的政权组织形式, 是孙、黄革命派的应有之意。他们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专门拟定了《军政府宣言》一章, 公布了军政府的宗旨及条例。后来, 孙中山等又起草了《军政府与革命军之条件》等文件, 对军政府的组织系统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建构。按照革命派的总体设想, 起义爆发后, 全国建立统一的军政府, “地方行政, 军政府总摄之”, 独立各军拥立都督, 直接受命于军政府。其措置之次序分为军法、约法和宪法三阶段, 军政府在前两个阶段中处于主导地位。军政分府则是在起义实践过程中建立的一级政权。起义前, 由于革命派对革命的复杂性估计不足, 对省区内蜂起的局面缺乏理论设计, 致使军政分府出现很大差异。分府的最高统帅有呼为督者, 有命名军政长者, 还有称总长、总司令者, 组织机构和职责权限亦不十分统一。

清朝传统的省、道、府(厅)、州县统治秩序被打破后, 中国政治制度进入了转型期。因为事先没有对军政府、分府的关系进行有效定位, 加之新的、固定的政治互动关系还没有完全形成, 两者整合过程中难免存在很多矛盾斗争, 这种状况从 1911 年 10 月 14 日第一个军政分府——汉口军政分府的建立, 一直持续到 1912 年 8 月的分府基本取消。就其形式而言, 既有明争, 也有暗斗, 既有口角磨擦, 也有武装冲突, 可谓多种多样。就其性质来讲, 既有革命派和立宪派的纷争, 也有革命派不同派别的对立, 既有集权与分权的较量, 也有专制和民主的消长, 同样不一而足。

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政治制度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 以往论者只是从立法、司法、行政等政治制度建设方面对之加以论证, 鲜有研究者从军政府和分府间的互动关系入手进行考察^②。其实, 行政统辖关系在政治制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从这个角度更能够对辛亥革命发展的广度、深度进行揭示。

辛亥革命爆发前,清朝地方统治采用省、道、府(厅)、州县管理模式。武昌首义后,独立各省大多在原来的省治地方建立了军政府,而道、府甚至县则以成立军政分府为主。其中,有的分府由革命派统一领导创建,有的为当地进步力量发起,而有的却是各派矛盾斗争的产物,其建立本身就蕴涵了与军政府的对立,此类情况以汉口、绍兴、吴淞军政分府最为典型。

在湖北,文学社、共进会之间一直存在矛盾,首义前夕,两派才实现了松散联合。武昌部分共进会员和下层官佐推举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起初,黎元洪对革命大计不闻不问,此举引起了文学社成员的失望和不满。10月14日,詹大悲、何海鸣等志士“会商蒋翊武、张廷辅、蔡济民、王宪章、吴醒汉诸将领,仓卒率兵二连,与蔡济民渡汉,成立军政分府”^③,驻地设黄汉德道衙署。与武昌军政府不同,汉口分府完全由文学社成员组成,詹大悲为分府都督,下设八处:“司令处詹大悲兼司令,温楚珩、王尔康副之;参谋处吴昆、何海鸣、余楚善;交涉处马少卿、刘润生、李文辅、谢虎生;军需处余楚善、尹亚一、吕丹书、罗衡久;军械处戴锡麟、李仲杰;军法处魏之纲;稽查处王光汉、潘锡玖;军政处潘江”^[1](第208页)。当时,“汉口战事激烈,詹大悲领导军政分府,做了大量的政治、军事工作”^[2](第196页),赢得了广泛支持,以李亚东为首的汉阳军政分府“一切部署,俱直接听命于汉口军政分府的詹大悲”^[3](第173页)。

与汉口稍有差别,李燮和开府吴淞则是革命派内部争夺领导权引起的。在全国革命形势的鼓舞下,以陈其美为代表的中部同盟会、以李燮和为中坚的光复会以及上海地方自治机构代表,三种力量共同推动了上海光复。其中,光复会员李燮和功绩最著,担任都督的呼声也比较高。

11月6日下午,上海各界代表50余人在原青海防厅署筹组新政权,主持人李平书提出由李燮和担任沪军都督,由于与会者多为陈其美的亲信,提议被否决。随后,王钟声力持“如上海不需都督则已,若需要都督,非陈(其美)君莫属。苟举非其人,余决以身家性命掷之”。紧接着,“蒋介石、刘福彪(标)、王季高大声急呼,‘请陈其美同志担任都督’!”“众无言,公举都督事总算大定。”^[4](第158-159页)对于这个结果,光复会部众表示不满,“光复军所部多不愿隶属‘冒牌都督’陈其美之下,吴淞炮台官兵主张尤其激烈。”^[5](第33页)于是,黄汉湘决定恭迎李燮和赴吴淞出任分府都督,李乃于9日率部抵吴淞,在中国公学内设立光复军总司令部,李燮和任总司令,改用“中华民国光复军总司令”关防^[5](第34页)。

与汉口、吴淞两地状况不同,绍兴分府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矛盾斗争的结果,程度更加激烈,而且已经完全公开化了。

杭州光复后,围绕都督人选,各派发生激烈争论。据汪振国忆及:“谘议局一些温和派的人物均力主推选大资本家大地主代表人物汤寿潜出任都督。激烈派的王金发就站出来反对,金发说秋瑾的被害,汤寿潜曾与闻其事,不应举为都督,提议另选他人。当时附和金发意见者亦颇不乏人,但谘议局里面的一些人,力劝金发收回另推他人的提议,金发态度坚决,不肯接受。”^[6](第64-65页)在立宪派的极力主张下,最终还是由汤出任都督,王金发非常不满,遂赶往上海找陈其美理论。由于陈暗中支持汤寿潜,金发失败返浙。回到杭州的王金发“无视汤寿潜,径自决定去绍兴,将敢死队中的嵊县人都带出去了”,11月10日组建绍兴军政分府^[6](第66页)。当时,许多光复会会员随之前往,谢飞麟、王世裕、徐叔荪、傅顽石、钱景江、余镜波等20余人,都在分府中担任一定职务,形成了革命派领导的政权。对于绍兴分府,浙江军政府也无可奈何,只得进行羁縻拉拢,遂派遣俞丹屏做了一个时期的安抚工作,“还特颁明令,加以褒奖,说王金发带领民军光复各处,部下异常辛苦,特提银一万元,交由王都督分配转给,以示酬谢之意”^[6](第67-68页)。未几,颁发了“绍兴军政分府之印”^[7](第493页)。同时,还通令其他各府一律成立军政分府,以期在形式上消除王金发的分峙对抗局面。

不惟如此,其它独立省份也存上述状况,江西省共进会负责人之一蔡锐霆在南昌鼓动起义,因受都督吴介璋的排挤,“遄返宜丰,发动绿营起义,被推为袁、瑞、临三路都督”^[5](第348页)。所以说,以上矛

盾斗争的性质主要表现为：革命派内部以及革命派与立宪派对领导权的争夺，是不同社会阶层、集团夺取新政权主导地位的分歧和冲突，分府的建立使之得到暂时缓和。随后，这种矛盾斗争又发展成为两个政权间的统一与分离。

二

据分析，除九江、寿州等少数几个地区外，其它分府基本都是在省城军政府之后建立的，二者成为新的地方政权。它们的互动充满了纷繁复杂的矛盾斗争，其中，既有革命派内部以及革命派与立宪派纷争的延续，也有稳固、维护自身政权需要产生的政治摩擦，其性质转变为集权和分权的对立。此种状况，时人也看得十分清楚，“计一省之地，都督之外，号称军政分府者，所在而是。及大势粗定，乃议合并，而缔约遣使，隐若敌国。其或怙势不下，日寻干戈，久而后定，若此之难也”^[8]（第6页）。

汉口分府成立后，詹大悲等独立执掌门户，总揽了军、政、外交以及筹措粮饷等事宜，而且还“自行其事，不受武昌军政府指挥”^[9]（第51页）。武昌军政府内的立宪派以及孙武等共进会员对之心存猜忌，“虑其权力过大，多方限制”，后来，趁设立粮台兵站的机会，调整了汉口军政分府的人事，“改詹大悲的分府都督銜为主任，何海鸣的参谋处长銜为副主任，温楚珩的政务处长銜为秘书，另委胡廷佐为司令，林翼支为指挥，从而削去了詹大悲与何海鸣的军权”^[3]（第173页）。这种做法激起了分府的强烈反对，矛盾集中在了对张景良的处置问题上。张本无军事才能，因见好于黎元洪被委任汉口前敌总指挥，而他却“别具肝肠，藉其地位，以阴通敌军”，“接都督命令后，东奔西突，不发一令，盖欲延宕时间，授清军以灭此朝食之机会也”^[10]（第328页）。事情败露后，詹大悲“执而杀之，不予以元洪”，黎对分府恨之益甚，日谋裁撤之方^[11]（第484页）。但是，他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直至10月31日汉口陷落，民军才“将军政分府自行烧去”^④。

绍兴、吴淞军政分府也表现出比较大的分离趋势，王金发“政出由己，每与杭州督府相对抗”^[7]（第479页）。吴淞分府则“与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分庭抗礼，各不相下”^[5]（第47页）。随着政权的稳固，军政府加紧了统一步伐，据周南陔称：“陈屡次约我和姜密商，拟以武力解决吴淞军政分府。”^[5]（第47页）余焕东就经历过此类事情，“当李燮和初至吴淞设立军政分府时，陈其美及其党羽甚为嫉忌。某日，余与李在吴淞车站乘车往上海，忽有人从车窗外放枪，射李未中，其随身卫兵中弹死。随后，陈其美又派会党头目某，携带手枪至军政分府与李燮和谈判，勒令李取消军政分府”^[5]（第36页）。不过，陈其美的愿望没有实现。和湖北、江浙地区一样，其它省的军政分府也出现了类似状况，尤其在事关政权发展的实际利益问题上，分府根本不予让步。

当时，安徽的“军政分府各自为政”，使省内统一政权的建立步履艰难。孙毓筠担任安徽都督后，庐州、芜湖等分府虽然在表面上表示拥护，但“仍凭借手中的武装，以安徽分府的名义相号召，截留税收，各自为政”^[12]（第163页）。黎宗岳更是有恃无恐，他“把持大通盐税、皖南茶厘，吞没盐厘及税务司每月向英德两国所付的赔款数十万”^[12]（第164页）。

江西省也是互不统属，“四个军政分府，四个分都督，都是光复地方有功的，尤其是马毓宝的功最大。江西因有这样多的军政府，全省的政权便不统一了”^[5]（第308页）。他们不仅不为省军政府分忧，反而还增加其负担，“截留所辖县份的钱粮厘卡款项，作为军饷，不足的还要向省城的都督府要”^[5]（第311页）。

四川的情况亦不容乐观，成都军政府的“阻碍甚多，其政令只能及于蓉城”^[13]（第523页），全省地方，分崩离析。鉴于此，成都、重庆两军政府做了大量工作谋求统一，成都方面“以颜缉祜任川西宣慰使，张澜任川北宣慰使，陈希曾任上川南宣慰使，李德芳任下川南宣慰使，黄籀青任川边宣慰使”，蜀军政府“派王休为北路安抚使，刘先觉为中路安抚使，陈佑为南路安抚使，冷忠培为下川东安抚使”，负责接洽各处军政分府，以期结束各自为政的状态。未久，各地分府“均陆续自请撤消，各府县政治逐渐统一于成、渝两军政府之下”^[13]（第510页）。

此时，由于还未形成统一的中央政权，各省军政府承担起了统一全省的使命，而分府为了自身利益

和发展往往与之进行对抗,再加上错综复杂的派别之争,导致整合过程比较缓慢。时人感叹称:“其最甚者,莫过于一省之中,复自为分裂,不相统属。”^[13](第 619 页)这一时期,二者矛盾主要表现为限制、反限制,发展为集权、分权之争。

三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统一全国军政、民政、财政成为最迫切的任务,1912 年 2 月 2 日,陆军部开始酝酿裁撤分府,28 日正式颁布命令。随后,有的分府遵令取消,有的为民国计稍作拖延,还有的慑于临时政府的威力,投靠了袁世凯集团,取消分府的行动也就隐含了南京临时政府与北洋军阀的对立,使斗争更加复杂、多变。所以,此时的矛盾逐渐转化为统一、分裂的较量。

临时政府成立后,各地分府依然“私自劝募军饷”,“目无法纪”,成为建立统一体制的障碍。为此,陆军部向临时参议院提出了取消分府的主张,并要求其筹划方略,“光复各省关于地方行政制度,尚未拟定施行,以致各府州县纷立军政分府名目”,“现临时政府成立,当力求军事之统一,及地方行政制度之制定。所有各府、州县所设军政分府亟应取消,代以他项机关,而妥定其权限,以谋军政、民政之统一”^[14](第 170 页)。未几,参议院就拟定了临时办法:“今官制既未订定,急宜发布临时命令将军政分府名目即日撤销,如地势上为应驻兵之处,应由该省都督酌设司令部专管该处军事,所需款项开列预算呈由都督核拨。其他民政财政悉由地方官主政,司令部长绝对不得干涉,仍候官制颁行后另遵通则办理。”24 日,临时大总统即给予批复,“仰即会同陆军、财政、内务三部遵照原议妥为办理可也。”^⑤28 日,陆军部正式颁发了裁撤分府的通告,文曰:“查军兴以来,各省以军事之要求,多于适要地点设立军政分府以资震慑。现战事已将告终,民政应设专员,军政应筹统一,军政分府多属无用,希贵都督酌量情形,将所属军政分府分别裁撤,以一事权。”^⑥

江西省分府取消过程中,彭程万出力尤多,据其回忆:“我首先通电省内外辞职,同时电请赣州、鄱阳两分都督也自动辞职”。不久,两地分府宣告结束。起初,萍乡并无取消之意,在他的极力劝说下也同意以大局为重,“萍乡分都督胡谦接我去电后,即复电,略云:‘你如果因兵力不足而辞职,我即刻把五十四标官兵兼程赶来南昌支援你,望你千万不要辞职。’我又去电婉为解释,重申前意,当被接受”^[5](第 308 页)。因为九江军政分府已于此前“改为都督行轅特设司令部”,江西省基本实现了统一^[15](第 213 页)。

浙江省于 3 月底召集各分府都督开会,议决 3 个月内一律取消。于是,各军政分府大多于“四、五月间先后遵令撤销”^[6](第 75 页),只有王金发未见行动。他派秘书长谢飞麟前往南京,向南京留守黄兴陈说利害,痛陈军政分府不可撤销。此时,浙江军政府都督“多方加以威胁,扬言要派军队去打”^[6](第 75 页)。后来,朱瑞商之陈其美,二人共同议定派应梦卿、俞丹屏为代表,前往绍兴进行疏解。陈还函劝金发“早日结束分府前来上海,以慰同志之望等语;信内并且说,分府账目不必移交,如有余款,即作为办理结束及遣散部属之用”^[6](第 76 页)。迟至 8 月 1 日,绍兴方面才同意“由丹屏代领其兵,离绍训练,军官仍旧,政务员分别去留”,从而结束了军政分府^[6](第 235 页)。

和其它省相比,安徽的政局更加混乱,都督更迭频繁,孙毓筠举为都督后曾“派卢仲农、王天培到庐州,派高季堂到芜湖,分别同孙万乘、吴振黄等进行协商取消军政分府”^[12](第 163 页)。3 月 13 日,省临时会议议员李时蕊、俞道暄等在安庆发起成立全皖联合统一会,亦派代表赴分府联络。

对于取消军政分府的命令,孙万乘首先响应,表示“先取消‘庐州’分府名义,所有各营军队,请陆军部另委贤能接带。至地方民政事宜,改归行政厅管辖”^[14](第 328 页)。随后,芜湖分府军政长官吴振黄也向南京临时政府表达了同样的心声,“依命将分府取消,并同时黄陆军部总长电委高等军事顾问官,拟将交代手续办理清楚,然后赴部任职,所有皖芜行政一切,均须直接安庆孙都督。”^⑦

此时,黎宗岳主政的大通军政分府却表现出严重的分裂倾向,他投奔袁世凯,将大通作为黎元洪的前哨,与东南各省同盟会势力争权夺利,公然与南京临时政府为敌。柏文蔚曾以陆军部名义电邀黎派代

表赴南京与安徽军政府、全皖联合统一会代表协商,约定3月20日前取消,“兵归部编,财政、民政、民权,由都督派员接收”^⑧。但黎因奉有袁世凯“仍驻大通”的命令,公开撕毁协议,于3月19日致电《共和急进报》叫嚣:“外间传言大通取消军政分府,此系奸人捏造,冀以摇惑军心。”^[14](第165页),声称大通分府“断无取消之意”^[16](第360页)。

21日,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命令柏文蔚率步兵队二营、机关枪一队、炮队二队、军舰二艘前往大通以武力强制解散。4月初,柏抵新洲时,仍派汪菊友、邵逸周等人对黎进行规劝,并许以“南京留守部次长”笼络,但黎表示“愿受北方袁氏节制”^[17](第112页)。随后,柏文蔚率军进发,并同时暗中与黎的部下胡聘臣接洽。4月6日,黎宗岳仓皇出逃,8日,柏文蔚不费一枪一炮安然抵达大通。大通事件的顺利解决是革命派的一次重大胜利,虽然面临袁世凯与黎元洪的双重压力,革命党人仍然以武力实现了统一。

经过南京临时政府和各省军政府的通力合作,截止1912年8月底,全国各地的分府基本取消,省内政令不一的局面结束,南京临时政府制订的军政、民政分治目标得以实现,省内新的行政关系初步形成,这一成果为进一步建立稳固的地方政权打下了坚实基础。

综观辛亥时期军政府、分府的矛盾,民国建立前主要表现为革命派内部、革命派与立宪派争夺主导权的斗争;民国建立后则是统一和分裂的较量、集权和分权的消长。两者的斗争中,行政统辖关系并不占主要地位,由于军政府、分府的驻地、辖区与清朝统治时期的省、道、府、县基本相同,长期存续的统辖关系、辖区观念使两者拥有很强的心理从属依赖,这也成为它们顺利实现整合的基础。所以,换言之,军政府、分府的矛盾斗争是派别与实际利益之争,是中央权威衰落后的权力再分配之争。

军政府、分府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其一在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领导集团,组织严重涣散;其二在于资产阶级对革命的复杂性、长期性估计不足,政权建设的理论相对薄弱;其三在于狭隘地域观念的影响。归根结底是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资产阶级发育不成熟所致。矛盾的产生、发展使革命者发生了内耗,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辛亥革命的进程,这是孙、黄等革命领袖不愿看到但又不得不面对的历史事实。

注 释:

- ① 辛亥革命过程中,政权建设是比较混乱的,在道、府、县驻地则更是如此。除了直接称军政府外,各地还出现了军政分府、军政支部、巡逻部、分统等政权形式,其中,军政分府占有很大比重。据不完全统计,独立各省组建的军政分府至少不低于74个。主要有湖北的汉口、汉阳、汉川、襄阳、郧阳军政分府。湖南的宝庆、湘西军政分府。江苏的松江、吴淞、常州、武阳、锡金、江阴、宜荆、靖江、镇江、扬州、通州、如皋、徐州、崇明、嘉定、昆山、清江浦、徐州军政分府。浙江的嘉兴、湖州、金华、衢州、严州、处州、宁波、绍兴、台州、温州军政分府。江西的九江、萍乡、鄱阳、赣州、袁瑞临军政分府。安徽的庐州、芜湖、大通、寿州、太平、屯溪、宁国、池州、殷家洲、太湖、桐城、镇阳关、六安、凤阳、亳州、颍州军政分府。广西的桂林、柳州、梧州、龙州、昭平、廉州、高州军政分府。福建的厦门、漳州军政分府。四川的嘉定、顺庆、叙州、泸州军政分府。云南的临安军政分府。贵州的安顺、大定、榕江军政分府。山西的河东军政分府。
- ② 目前,关于军政分府的研究并不多见。仅有林炯如、傅少昌等主编的《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和钱实甫撰写的《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34—435页)两部专著对之有所提及,但并无详细论述。相关的文章主要有:1、程昱康:《试论绍兴军政分府的性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2、周育民:《辛亥革命时期的“江苏统一”——兼论辛亥革命时期的苏沪行政关系》,《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42—365页;吴珂:《江苏辛亥光复后的政权剖析》,《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5期。
- ③ 参见佚名所写手稿《詹大悲先生事略》(原件藏湖北省博物馆)。
- ④ 参见《申报》1911年11月7日。
- ⑤ 参见《临时政府公报》(第21号)1912年2月24日。
- ⑥ 参见《临时政府公报》(第24号)1912年2月28日。
- ⑦ 参见《临时政府公报》(第27号)1912年3月1日。
- ⑧ 参见《民立报》1912年4月2日。

[参 考 文 献]

- [1] 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 [2] 湖北省政协文史办公室.辛亥武昌首义主要人物传略[J].湖北文史资料,1981,(4).
- [3]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志大事记[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
- [4] 章天觉.回忆辛亥.辛亥革命史丛刊:第2辑[J].北京:中华书局,1980.
- [5] 中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Z].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 [6]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Z].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 [7] 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浙江省图书馆.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Z].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 [8] 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6辑[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 [9] 中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集[Z].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 [10]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 [11]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詹大悲传.革命先烈先进传[Z].上海:上海印刷厂,1966.
- [12] 安徽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安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辛亥革命在安徽[Z].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 [13] 隗瀛涛,赵清.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 [1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Z].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 [15] 许师慎.辛亥江西光复记.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各省光复[M].台北:正中书局,1976.
- [16] 张炳湘.辛亥革命在安徽资料汇编[Z].合肥:黄山书社,1991.
- [17] 丘权政,杜春和.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下[Z].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 桂 莉)

Contradiction between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Branch Government during 1911 Revolution

HUO Xiu-yong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HUO Xiu-yong (1973-), male, Post doctoral researcher,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odern history.

Abstract: After firstly revolting, many Military Governments or Branch Governments were founded, which broke the dominant system of Qing Dynasty.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China started to turn autocracy into democracy. During conformity period, the contradiction is hard to avoid. The combat is both open strife and veiled struggle, and sometimes sharp sometimes gentle. The character is as abundant as the form, of which is not only constitution with revolution, but also autocracy with democracy. At the lead of Nanjing Provisional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Government, Branch Government all over the country has been canceled before August 1912, and new political order was formed.

Key words: Military Government; Branch Government; conformity; contradiction